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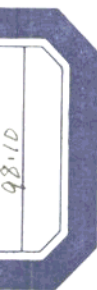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他山之石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胡 海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目 录

一、假西方文化之石，攻中国现代化之玉	(1)
二、西方文化的历史演变	(11)
三、赛先生——重道轻器观念的转变	(21)
四、德先生——封建政治意识的清除	(30)
五、呼唤法治精神——人治传统的突破	(41)
六、义利并重——正视西方功利原则	(49)
七、集体主义的灵魂——个性精神	(58)
八、超越之路——中儒西哲的沟通	(68)
九、中国基督教——终极关怀的福音	(82)
十、多元共生——融汇西方文艺思潮	(98)

一、假西方文化之石， 攻中国现代化之玉

中国现在到了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关于世纪末和新世纪，流传着许多古老的与时尚的预言。预言虽然不会带来宿命的巨变，但它所折射出的全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的特殊心态，是会对实践造成一定影响的。尤其对于经历了辉煌与失落，现在正以良好态势前进的中华民族来说，一种紧迫感和兴奋感使全国上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步更大更快。朱镕基总理在就职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宣布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以及“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强烈地叩击着世纪之交全国人民的心弦。

文化转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或者说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新体系，是自十九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实践着的课题，也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着的课题。经历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结合等种种观点的冲突，现在人们已达成共识：要实现文化转型，一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二要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文化转型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这需要确定文化的概念内涵。文化概念有多层次的涵义。人类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所创造的、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可谓之文化。若对文化概念作静态考察，可以借用李振刚先生在《文化忧思录》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任何文化系统都可分为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两个部分。显形文化大体是指器用物质文化和组织制度文化，隐形文化则指隐含在文字、艺术、道德、宗教及其他学术思想之中的以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心理。”

更为具体一点说，文化可分为硬件部分，即物质文化，包括一切物质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必需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等等，以及人类赖以生存而又予以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也可分为软件部分，即精神文化，主要是学术思想，观念，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文艺、教育、伦理、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等等。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或以文本方式为载体，或体现为各种制度、体制，及风俗、习惯等等。

基于上述辨析，我们可以确定文化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转型，四个现代化就属于这个范畴。有人说，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不发达国家的将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讲确实如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在物质方面，基本上就是以西方为参照，为目标，为赶超对象。

但是精神文化的转型是不是向西方转型呢？全盘西化论者是持此说的。但是这个结论太简单化了。物质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直线型的，旧的不断为新的所取代，先进、落后之间的界线是一目了然的，如同清政府的大刀长矛敌不过英法

联军、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样显而易见。而精神文化的发展却是重叠型的，它有强大的惯性与惰性，旧的决不轻易让位于新的，新的也很难完全取代旧的，而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人的思想、观念，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有相对永恒的趋利避害、求真求善求美的因素，它们是不会轻易随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变迁的。所以，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精神文化的尽善尽美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在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属于思想、情感领域的精神文化，既受物质基础的根本制约，但又经常超越有限的物质条件，在社会贫困或动乱之际升华到文艺、哲学、伦理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境界。中国在物质文化上暂时落后于西方，但在精神文化上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来说，首先，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精神，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其次，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既包含了其传统的精华，也不可避免保留了传统的糟粕。它作为一种现代形态，在产生新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会包含新的消极因素。我们要在分析整个西方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既能促进中国精神文化的转型，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倾向，便是认为中国的精神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这是中体西用论者的老调。物质与精神是相互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新发展莫不与物质文化的进步相关。所以现代西方精神文化在很多方面也是比我们先进的。

精神文化转型的关键是观念的转型。我国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人的观念是落后的。即使那些人被称或自称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谓的现代观念，往往是从西方简单移植过来的，未必真正融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即使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是西方社会的实践积累给我们的痛苦经验，他们的失败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尊重而不是蔑视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以之为鉴，而不是以讥嘲的言论来强化我们的尊严与信心。

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已不必再讨论是否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也不必再纠缠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论争以及简单的折衷调和，包括方法论——批判吸收、拿来主义，也都无须再探讨。与改革开放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可以拿来，哪些无须接受。这就要求了解西方文化的现状与历史。同时，西方文化的涌入并不是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学界的理论探讨可以事先规划、操纵的，所以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精华与糟粕的东西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社会，进入中国的文本，和人们的观念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过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正本清源，摒弃糟粕，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的批判吸收。

西方文化的物质方面，如资金、设备、人才、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是较为直接的，是实际操作的，其影响是显著的，也是短期性的。因此，对这一过程的回顾与反思，实际上包含在对西方精神文化之吸收过程的回顾与反思之中。西方文化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宗教、哲学、伦理观念，影响我们的文艺思潮、社会心理等等，因此带来

了思想观念、理论、方针政策上的一系列变化，并导致体制上的一些变革，影响到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回顾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过程，总结这方面的成就，发现问题和展望未来，主要是就精神文化方面而言。文化转型，主要也是探讨精神文化方面的转型，包括体制的变革与观念的突破。体制尤其是观念的现代化，其影响是长期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开始大面积接触以来，以新中国成立、中国有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中西文化之间有了平等对话的基础为转折点。更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正式开始主动、积极地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为又一新起点，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在精神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由于德先生即民主精神的传播，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意识逐渐被清除；由于赛先生即科学精神的传播，中国轻视知识和理性、一味注重形而上学的冥想、玄想、空想，远离实践的重道轻器观念实现了转变。与民主相适应，西方文化中贯穿了法的精神，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人治为传统，以明君贤臣为天意、公理和正义的载体，以圣人高士为思想权威和智慧灯塔，他们共同构成整个社会的人治系统。西方法治精神仍将对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与封建政治意识和人治传统相应的是人权观念的毁灭。虽然新中国在人权建设上成就辉煌，但理论上却很滞后，以至受到西方人权外交的攻击，这也促成了政界和学界对人权理论的注重，并且在取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形成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权学说。今年美国政府不再在国际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无疑是我们吸收和超越西方人权学说的伟大成果的证明。

封建中国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这一传统建国后演变为姓资姓社的界线高于经济效益、重主观意愿（动机良好与否）不重实际效果、重思想品质不重实际作为的社会风尚，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西方以契约淡化伦理的宽泛职责、以市场激活经济行为，宏观调控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为我们借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成了重义轻利观念的转变，人们不再以谋利为职，不再视重利者为小人。但是，重义的传统仍不能丢。谋利应在契约（法律）与道德的范围内，应该义利并重。因此，在市场杠杆调控下，道德调控仍然是不可缺的，思想教育仍然是不可放松的（只是方法要改进）。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中国是重义轻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中国则是追求“天人合一”。两者共同体现为“和”的审美理想与伦理理想，而备受当代西方社会关注。中国既要维护重义的传统，亦即维护人际和谐，也要维护天人的和谐，不再重复工业文明对人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避免极端商品化、物质化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防患一系列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环境问题于未然。

宗教一度是我们忽视的问题。虽然我们国家的政策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这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认可这种组织与活动。至于宗教思想、宗教精神与社会生活、人类心灵的内在关系却较少探讨，甚至不以为然。我们一直忙于经济建设和各种社会运动，注重物质文明的提高和思想的纯化——也可以说是以理想化的要求来抹杀民众千差万别的心灵。在中

国，宗教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而且活动区域往往是在远离尘世的荒僻地带，或在民间秘密进行，为主流话语所遗忘。直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绝大多数人对宗教还是不理解、不关注的，虽有宗教意识亦不自觉。宗教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不可取代的，它对于道德秩序的建构也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因为它不是自上而下由社会强加，而是每一个体心灵的自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道教与佛教中所获取的心灵慰藉与精神动力，使他们能够成为民族脊梁，百折而不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屡经磨难的儒者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与人世的姿态，与他们有一个佛教和道教的精神避难所密切相关。

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基督教。不论是以文化使者还是侵略者的面目出现，它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尤其带来了西方的民族精神。爱他人，爱邻人，爱敌人，这种非同凡响的宽容精神，对于苛厉的儒家道德人本主义传统来说，是一种意义非凡的中和。现代基督教融入了许多现代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的因素，这些国家如能借助宗教的力量在国人心中驻留、生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会起到间接但长期而深刻的辅助作用。

但是，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的代表，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多次冲突，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漫长的三自道路，它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积极方面。我们有必要总结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其精神内核作进一步的挖掘，以求进一步的批判吸收。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是超越式的精神活动，是

面向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指向无限的自由思考。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前者重天人和諧，而以妙悟为天人合一的途径，后者在自然面前高扬人的主体地位，而以沉思为把握自然的手段（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与西方的高扬主体性不是一回事。康德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与本体界，主体在现象界与本体界相对独立。中国的人本主义则混同现象界与本体界，主体总是试图揣摩、把握本体界，从而丧失了主体性。又因以个体权威把握本体，从而使大多数人丧失个性与自由思考）。现在西方已经开始反省自我意识的过度扩张，而国人也在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客观、冷静的把握，包括使用逻辑分析与推理方法和实验方法，同时个体思考不再为群体思考所替代，不再为借助群体形成的个体权威所抹煞。中儒西哲的沟通对中国与西方的意义是同等的重要。但是这种沟通已经达到何种程度？还应当如何推进？这方面的总结与展望也许不会有直接明显的社会效应，可哲学作为人类思考的必然需要，其本身就是意义。更何况它还可能会有许多隐性的现实效应呢。

中国的文艺思想建国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现在的文学概论实际上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列文论。马列文论贯穿于整个文学研究与教学之中。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文艺是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离政治也较哲学、法律为远。而中国的文艺与政治结合太紧，所以文艺成为阐释、论证、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失去了学科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当然是对文艺有根本指导意义的，但根本不能取代直接。俄苏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将根本的指导性原则转换为直接

的文艺原理，使得文艺原理只与社会实践、政治运动有关，而远离文艺实践。西方文艺思潮在对文艺本质的认识、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的创新上是成绩斐然的，与西方多姿多彩的文艺创作相辅相成。中国的文艺创作却几度消沉，至今萎靡不振，这与理论的苍白很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研究者们演练西方近百年的文艺创作与批评模式，虽然至今仍然不得要领，但也为融汇西方文艺思想、形成合乎文艺实际和新时代要求的文艺理论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由于受评职称、出成果的影响，学者们急于发表“新”看法，不惜作西方学说的“二道贩子”，并借助信息优势垄断学术话语权力，而不注重扎实的译介工作和整理工作，不注重西方亦包括古代学术思想的正本清源，更不注重学术的普及工作，浅入而深出，使学术沦为学者的自娱、自慰，以至成为喃喃自语。这种现象在文艺理论界尤为突出。我们应该结合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代社会生活状况，对西方文艺思潮进行客观、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介绍与运用不是一回事。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艺实践只能是启发式的，不能是操作性的。我们可以借鉴其文艺认识、思维方式、评论方法、创作技巧，但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状况，结合中国文艺实践的需要。而不能是出自简单的反传统、反主流心态而矫枉过正，更不应出于学术之外的目的而将西方文艺思潮作为新的工具。至于借助文化开放的形势以演练西方文艺思潮哗众取宠就不可说了。总的来说，在吸收西方文艺思潮的过程中，出现种种误读、曲解、滥用是难以避免的。只要现在开始对此进行清理，我们会发现收获仍然是很大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同志说：“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真正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 31 页、32 页）“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 154 页）总设计师为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定下了决心和基调。总结成就，反省不足，展望未来，中国文化转型必将以良好态势进行。

二、西方文化的历史演变

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是一个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话题。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西方文化自身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在变化，而作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我们了解和理解的西方文化也在变化。洋务运动时期的西方文化主要就是坚船利炮，或曰近代工业、近代科技。“西方”则主要是指英、法、德、俄、美、意、奥等入侵中华的列强。日本虽是东方国家，实际上也被列为我们学习和对抗的国家之一，有一点“西方”的意味。五四时期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指西方思潮、制度与民族精神，笼统以“民主”和“科学”代表之。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思潮的一种，而后逐步本土化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西方文化对于国人实际上是陌生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一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已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批判了），我们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因此俨然有了人类救世主的豪情和未来世界主人的乐观；二是来自西方尤其是俄苏的思想家和作家对其腐朽没落现象的揭露与抨击，现时我们关于西方的翻译、介绍集中在“阴暗方面”，这样是能增强我们的信

心、尊严与幸福感；三是来自于对民国时期混杂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因素的大小资产阶级意识、立场、情调的清算；四是来自于对西方阵营反华、制华罪行的揭露与反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完全为政治所左右。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本身进入多元化的状态，作为物质文化，一切工业发达国家都属于西方范畴，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作为精神文化，我们固然与所有西方国家都有文化交流，但是，由于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由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最为众多，也由于美国有意实施的对华文化攻势，所以，美国几乎成了西方的代名词，西方文化几乎成了美国文化，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吸收一度几乎全部针对美国的制度与思潮。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吸收各民族各国家的优秀文化。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也作为相对东方在今天更为发达的文化，比其他东方国家更值得我们关注。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决不能等同于文化影响。我们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一些。因此，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应该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把握其整体状况，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中，抛弃其糟粕，发现二者相通之处以相印证，而引进其精华。

西方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现当代西方文化，或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前三个阶段是与中国在平行轨道上相对应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作为异质传统可为中国文化充注新的因素，或曰外力；后一个阶段则是体现出西方文化的先驱性，也就是较我们更为进步一些，他们的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的将来，所以应当为我们学习。而他们在发

展中又会出现一些问题，存在许多不足，可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它所依赖的地理环境与古中国是不一样的。古希腊由一系列岛屿、半岛和海岸组成，境内山多耕地少，矿藏丰富而粮食匮乏，这就使得海上贸易、殖民乃至海盗活动成为必然。频繁的航海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文化上的后果：一，眼界的开阔、眼光的改变产生了神和人的新观念，多个的地方神演变为统治世界的一群神，最后统一为基督教的一种信仰，为西方人的精神自由留下了极大余地。中国则是泛神信仰，以现实性取消了超越性；尤其是祖先神化，强化了遵从传统的保守意识。二，迁移后对故土的思念，风暴平息后的寂寞，导致了神话与史诗的产生，中国尤其是汉文化则没有完整的神话与史诗系统，缺少一种崇高感和悲剧精神。三，迁移带来了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杂，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社会组织原则是法律与地区原则，而不是习惯与血统。中国则是宗法制社会结构。四，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抗争使西方人懂得了工具和武器的重要，萌生了注重物质力量的世界观。与茫茫大海的抗争使他们认识到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素质而不是数量，是航海知识和技术而不是船只大小。中国则发展了人文主义传统，注重天人和谐，顺应而非操纵自然，人只在人类自己的范围内努力，探究自然也是为了比附人事。五，瞬息万变的海上环境，到达陆地后的新困难，使人们具备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挑战精神、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和自由、冒险、创造精神。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

为了防范海盗，也为了在迁移后确定自己的新领地，古

希腊人建起了无数军事要塞，围绕要塞形成了市场，最后合为一个完整的城市。移民后建立的城邦虽然在文化上同母邦一致，隶属关系却很松散，从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民主与自由精神的高度发展。在希腊中期，除斯巴达外，雅典在梭伦改革后，民主制度开始形成。到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实现了直接民主制。中国（印度、埃及也是一样）文化发源于大河流域，展开于广阔的平原，单纯发育了成熟的农业经济，国脉系于发达的灌溉系统。水利事业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组织，对付自然灾害，需要国家力量对多灾地区进行赈济。分散的小农经济使人际与地区之间没有广泛联系亦无激烈冲突，道德礼仪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这就是中国社会政治——道德秩序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度引起哄动而后又受到全面批判的《河殇》，将西方文明界定为蓝色文明，也就是海洋文明，与中国的黄色文明也就是内陆文明相对应。《河殇》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的起点是正确的，是基于古代文明主要受地理环境影响这一事实。但随着历史发展，人类文化会越来越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广泛，海洋与大陆之间不再是壁垒分明。文化内部运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促动越来越超越地理、气候条件而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河殇》是一种机械的历史观、静止的文化观，将中西文化视为两个静态系统进行跨越历史阶段的比较。在此我们应该注意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文化与文明都是外来词，从词源角度讲，文化——culture 一词来自拉丁文 cultura，本有“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含义，文明——civilization 一词来自拉

丁文 civilis，原是“城市、国有、公民的、国家的”的意思。一般认为，文明是一个静态系统，是已成为历史和现实的人类成果，或者说人类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它不仅包含过去和现在，还指向未来，不仅包含结果和成果，还包含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时，“黄色文明”确如《河殇》所言，以封建时代为终结。但这不等于中国文化为西方文化所取代。“黄色文明”是逝去的文明，中国文化却将在继承这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即使从封建末期黄色文明终结开始，中国文化完全重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所走过的道路（理论假设，事实上不可能），那也不是蓝色文明对黄色文明的胜利，而只能说是西方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方向与共同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假设），而中国文化按此趋势摆脱了旧的文明阶段。因此，“全盘西化”是一个概念上不明确、实践中不可能、理论上无意义的论调。黄色文明、蓝色文明概念上的使用则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相混同，从而支撑起《河殇》激情有余、理性不足、逻辑紊乱的文本系统。

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基督教是希伯来传统和古希腊传统相融合的结果。希伯来人原是闪米特族的一支，游牧于阿拉伯沙漠以南，后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又渡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来到迦南，被当地人称作“从河那边过来的人”（Habiru），后转音为“希伯来（Hebrew）”。扫罗时代，非利士（Philistines）侵入迦南，将其占领区称为“非利士人的土地”（Palestine），即“巴勒斯坦”。希罗多德在其史著中沿用这一称呼，“巴勒斯坦”之名遂流传至今。

犹太正教是在公元前 537 年，居鲁士王颁令准许被掳的